

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规范研究

辛吉吉 曹 斌

(山东经济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发展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社会责任问题也逐渐成为理论界的热点话题, 本文在分析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甄别认识误区的基础上, 从国际社会协作、跨国公司自律、东道国制度约束等方面, 提出了包括制定和优化约束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实现的行为准则, 跨国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及东道国政府制度、道德约束等几个方面的建议, 以期对规范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能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 跨国公司; 社会责任; 自律; 约束; 规范

[中图分类号] F2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71X(2008)01-0139-05

一、文献回顾

国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是否应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内容等方面。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 学者们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持反对态度的观点。这种观点反对或从根本上拒绝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与提法, 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提法有悖于企业法的传统, 而且其含义不可识别, 所以无法获得一致的认同, 更不可能成为法律上可操作的概念。第二大类是对社会责任持赞同态度的观点。这类学者赞同企业社会责任观的提法, 认为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但是这类学者们在企业究竟应当承担哪些社会责任、在其范围与内容方面上持有不同的看法。

此外, 管理学者斯蒂芬·P·罗宾斯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 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他区分了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 认为一个企业只要履行了经济与法律责任, 就算履行了社会义务, 而社会责任则是在社会义务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个道德责任, 它要求企业分清是非, 遵守基本的道德准则。管理学者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认为, “公司的社会责任就

是认真地考虑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国内专家、学者对企业伦理价值和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广泛研究, 取得了一些进展。学术机构也致力于介绍和引进西方社会责任的理念, 出版了一些关于社会责任的专著,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俊海的《公司的社会责任》、谭深与刘开明合著的《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社会》、卢代富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编的《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和黎友焕的《SA8000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等。从已有的文献看, 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主要从经济学、伦理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范围、内容、重要性以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角色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

综上所述, 尽管对企业社会责任有多种表述, 但有其共同点, 即把企业社会责任看作为除了为股东追求利润外企业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也就是要考虑相关利益者, 考虑影响和受影响于企业行为的各方的利益, 追求社会利益相关者的满意, 如关

[作者简介] 辛吉吉(1978—), 女, 山东济南人, 山东经济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管理理论与方法。

注企业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和工作条件等。

二、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被重新重视并成为—个全球性的社会运动。按照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要求,作为—个商业组织,企业不能以利润作为自己惟一目标,而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色彩。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采用世界永续发展委员会(TUCSV, 1999)的定义,是指在特定的法律框架、社会规范和经营环境下,跨国公司在履行其基本经济职能的同时,承诺持续遵守道德规范,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且要持续改善员工及其家庭、所在社区、社会生活的品质,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实际上,关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问题历来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论:按照古典的(或纯经济的)观点,认为跨国公司惟一的社会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跨国公司的责任不仅仅要使利润最大化,而且还要保护和增加社会财富。

古典观强烈地反对跨国公司承担任何责任,认为承担责任倒不如高效地生产产品和服务,为股东尽可能多地创造利润。这种观点的核心是认为公司是一个经济实体,经济价值观应该是公司行为决策的惟一因素。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弗里德曼(Friedman, 1970)坚决拥护这一观点,他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如果产品的市场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生产这个产品的相对成本,而是包含了社会成本,那么市场的分配机制就被扭曲了。任何公司因承担社会责任而使成本增加,市场的残酷性就会威胁到他的竞争地位。

而社会经济观是在与古典观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包括社会契约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该观点认为,公司是社会认可的产物,理应对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现在时代改变了,人们对公司的期望也改变了,公司就应当顺应这种改变。其中社会契约论认为企业与社会之间达成了一份公正的协议或契约,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相互之间应该承担的责任。经济活动必须在一定的道德框架范围内进行,社会个体和群体都受到社会契约所规定的有界限的道德合理性的约束,那些低于最低道德限

度行为的不法行为最终将会被驱逐出自由市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原先公司只是对股东负责,利润最大化是惟一的目标。而现在,他们则主要对:消费者、股东、雇员、政府和社区这五大利益相关者负责,并且强调管理的道德责任。跨国公司实行利益相关者战略,必须要按照—个广泛的普遍原则框架,权衡各种组织或经济共同体所产生的利益相关者责任。

虽然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论,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跨国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公司和社会是一种共生关系,公司的发展和繁荣,有赖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社会的安宁幸福又依赖于公司的盈利和责任心。

三、为什么跨国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

跨国公司大多属于寡头垄断者,在行业中占据有利地位,控制着世界绝大部分的技术资源、物质资源、财务资源和贸易渠道,此外,跨国公司还具有所有权、区位、内部化这三大优势,从而具备了比母国投资获取更大利润的“权利”。从经济和商业伦理的角度出发,按“权利”与“责任”相对等的原则,获得了更高收益的跨国公司理应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许多项目是在母国环境标准下不能生产的,通过投资跨国公司把环境问题直接转嫁给了东道国。东道国在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抉择时,环境问题往往被忽视,也许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且,跨国公司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大量使用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一切有权力的人往往会滥用权力,为了防止产生无视弱势群体的政治自由和工会权利等劳工问题,跨国公司也有必要在东道国采取行动维护劳工基本权利的措施,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东道国为了获得更多的跨国投资,往往给予跨国公司超国民待遇,使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控制难度加大。尤其是力量相对弱小的东道国较容易受到跨国公司的冲击,因此需要东道国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制定相应社会责任规范,减少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对于跨国公司本身而言,也应当正视其社会责任问题:

其一,跨国公司作为—个经济实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可非议,但财富的获取应当有道德背景,道

德决定了市场效率的可能范围。

其二,现代企业文化、企业精神的凸显是跨国公司获取长远利益、在市场与忠诚客户群心目中长久生存的生命力之所在。一个真正成熟的现代企业不仅仅是具有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成熟营销体系的经济实体,更应当形成既能为社会所认同,又具有广泛凝聚力的独特企业文化。

其三,跨国公司在进入新兴市场后,有一个公司及其品牌认同的问题。只有短视的公司才会不顾声誉、不顾人们感情地捞取眼前的利益。而公司声誉的取得离不开社会责任的承担。不利用所在国法律的漏洞牟取利益,这不仅是罗尔斯(Royles, 2003)所说的现代公民美德与能力,亦是跨国公司的企业精神。

企业作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主体,履行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责任,将会直接促进社会物质和文化的繁荣,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但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需要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劳动提供者、资源提供者(包括资本、土地和半制成品的提供者)、顾客或消费者、社会和政府的代表—政府(尤其是跨国公司所在的东道国政府)都是跨国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的经济性决定了企业的基本责任是最大限度的赢利,而企业的社会性又决定了企业是否能与社会环境和谐共生、与关联企业合作双赢。随着竞争的深入和公众的关注,企业必须自觉地将社会责任纳入其经营战略,兼顾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塑造良好形象,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认识误区

1. 纯粹的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是个体借以实现其精心计算的短期自利的方式;价值理性行动则取决于对真美或正义之类较高等级的价值。从纯粹的工具理性的角度理解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依然没有摆脱以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说为基础的传统西方经济学对企业的界定,坚持认为企业存在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不过是将其作为保证企业长期盈利的工具和手段。这一认识的误区在于,似乎只有假定跨国公司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实体这一惟一前提,才能使企业行为具有可预期性和合乎逻辑性。

不可否认,跨国公司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其利益具有独立性和排他性,其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不能因为强调社会责任而忽视的重要内容。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物,它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必然面对双重责任:既要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必须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人类的福利负责。因此,跨国公司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不能仅仅将承担盈利之外的社会责任片面地理解为一种为了长久盈利而使用的时髦工具,而应将其理解成为了共同的社会目标而努力的价值追求。

2. 社会责任等同于经济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的区分,是早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据以提出和构建的基点,也是早期传统理论的信奉者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之间展开“论战”的出发点。长期以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支持者也都是将单纯的企业经济责任作为其“对立面”来加以反击的,可见,这种反击前提上就预设了企业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各自的差异性和存在的独立性,企业经济责任不应也不能被企业社会责任所吸收和包含。受国外理论的影响,近年来,国内许多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探讨者认为,跨国公司利润与中国社会的福利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跨国公司对利润的追求也具有社会功能,其利润最大化也就意味着对我国社会福利贡献的最大化。虽然我们并不否认,跨国公司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确实也尽到了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但显然不能简单地将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等同于跨国公司自身的经济责任,这将混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与其经济责任的界限,模糊甚至掩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与其经济责任的冲突,也使调和或解决这种冲突的努力可以轻易被忽略。

3. SA 8000

如前所述,在“生产链”生产方式下,“血汗工厂”层出不穷,跨国公司为维护公司形象、回应劳工组织和消费者的呼吁,纷纷制定供应链行为准则和生产守则。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获得众多跨国公司投资青睐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跨国公司生产守则和其他社会责任标准的约束。具体到 SA8000

(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 它是由美国民间组织——社会责任国际(SAI) 制定的一个以保护劳工环境和条件、保障劳工权益等为主要内容的标准管理体系, 主要涉及童工、强迫性劳动、健康与安全、自由结社及集体谈判权、歧视、惩戒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等 9 个方面的内容。SA8000 不同于国际通行准则 ISO9000 和 ISO14000 , 作为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标准, 尽管 SAI 一直致力于将其纳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和国际认可联盟(IAF) 系统, 但均遭拒绝。同时, SAI 也一直在努力寻求政府和跨国公司的支持, 但至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要求强制执行其标准, 认可其效力的跨国公司也为数不多。由此可见, SA8000 在整个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有限, 我们不能将其等同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

4. 自发的道德自律

自发的道德自律与“生产守则”运动相关, 跨国公司运用它迫使供应商遵守劳动标准和环保标准, 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相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 跨国公司推行“生产守则”的行为, 成为了跨国公司本身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志, 这很容易使人产生跨国公司仅仅是出于高尚的动机才这样做的错觉。同时, 出于对单纯“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现代经济学一般认为企业不仅是“经济人”, 还应当是“道德人”。但人们往往将“企业应当成为‘道德人’”这一价值判断误读成“企业是‘道德人’”这一事实判断, 而出于对自身形象的塑造和追求, 跨国公司往往又采取一些诸如捐赠、扶贫、关注青少年成长等公关行为, 这就更容易让公众产生作为“道德人”的跨国公司, 其社会责任行为是自发的道德自律的结果。

五、规范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的建议

1. 国际社会方面

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协作, 进一步制定和优化约束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实现的行为准则。应该看到, 约束跨国公司行为的各种规则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 还缺乏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之有效的国际硬约束。因此, 现在各种专门性国际组织的主要任务应该是, 以发展为核心, 以大量的谈判为手

段, 促使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有关的诸多问题尽可能纳入到一个相关各方广泛参与讨论的框架中来, 并形成一定的硬约束机制。只有这样, 才能达成相关各方的共识, 提高标准, 实现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有效国际约束。

2. 跨国公司本身

从社会伦理及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考虑跨国公司应注意约束自身的行为。跨国公司通过主动约束自我行为来承担其应尽的社会责任是最为有效地解决手段。具体来说, 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导入由职工代表、消费者代表和用户代表参与决策的制度, 以强化社会各方对公司行为的监督与约束; 委托基金会、非政府组织或顾问公司, 开展工人发展能力的综合项目研究, 通过提高工人的发展能力, 来推行他们的劳工权益和保护工作, 以应对来自消费者运动、国际社会、东道国和自身商业化伦理道德的压力; 应建立起符合自身行业特点的企业社会责任内部审核制度, 或者就有关问题发表专门报告, 或者建立系统性的独立监督和审查程序, 这将有助于跨国公司遵从法律或规制, 并依从于各种“柔性”社会控制方式, 从而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发展。

3. 东道国方面

第一, 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超国民待遇”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吸引外资重要的优惠政策之一, 曾为中国的外资增长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一些外资企业却利用“超国民身份”大玩“擦边球”游戏, 或以撤资相要挟, 迫使个别地方政府违规批准其进入且享受特权。在提倡国民待遇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跨国公司曲解“国民待遇原则”。

第二, 按国民待遇原则, 东道国政府应建立起企业社会责任审核制度, 要求跨国公司制定其社会责任活动规划, 并定期提交社会责任绩效报告。通过年度社会责任的审核, 来监督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实施情况。

第三, 尽快完善和严格执行相关立法。跨国公司把高污染的企业、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 恶化自然环境, 是因为我国环境标准低, 环境保护的力度弱, 对于环境污染的惩罚轻, 因此, 应尽快从法律层面上规范外企的经营行为。另外要(下转第 151 页)

需要长时间的研究和大量取证,本文的工作还只是抛砖引玉。

【注】

①英国的托马斯·孟于1630年写作了《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在此书中,他阐释了只要存在出口盈余,一国就会产生财富积累这一早期的“重商主义”观点。

②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后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危机后的新自由主义,以及70年代是石油危机后出现的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思想。

③20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霍加特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建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被认为是文化研究专门化的开端。

参考文献:

[1] 斯坦利·L·布鲁. 经济思想史[M]. 北京: 机械工业出

版社, 2003.

[2] E. B. Taylor, The Origin of Culture[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8.

[3] Richard S. Kennedy. Who Is Culture's Keeper?" [J]. Foreign Policy, No. 133.

[4] Richard P. Nielson: "Culture—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9, Vol. 4.

[5] 莱夫·桑考斯基. 美国——民族百衲图[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6] 曲如晓, 田桐桐. 发展中的道德贸易[J]. 国际贸易, 2005, (06).

[7] James R. Lee: Exploring the Gaps: Vital Links Between Trade,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West Hartford, CT: Kumarian Press, 2000.

(责任编辑: 程美秀)

(上接第142页)

尽快完善相关的投诉渠道,使各种跨国公司产品的质量能够及时进入正常的法律程序,同时也迫切需要及时完善相关诉讼程序,参照国外标准相应提高跨国公司产品质量违规行为的赔偿成本。

第四,强化包括消费者、行业组织和社会舆论在内的社会监督。对跨国公司在本国从事的各项经营活动、他们已出台的有关社会责任方面的各项举措以及其破坏本国社会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约束。

第五,我国政府要加强与国际相关组织(如全球工人与社区合作计划)和跨国公司的合作,通过一定的培训项目来提高本国劳动者的生产、生活技能以及社会和自我发展意识,从而使本国劳动者在整个跨国公司履行自身社会责任的过程中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相关利益人中的积极能动者。

参考文献:

[1] 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 企业、政府与社会[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2] 谭深, 刘开明. 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社会[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3] 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4] 刘恩专. 论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J]. 国际贸易问题, 1999, (03).

[5] 朱鸿伟. 经济全球化中的跨国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J]. 南方金融, 2002, (02).

[6] 葛顺奇, 李诚邦. 社会责任: 跨国公司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J]. 国际经济合作, 2003, (09).

[6] 黄新.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问题思考[J]. 黑龙江对外经贸, 2005, (03).

(责任编辑: 程美秀)